

讲坛之光系列丛书

经济中国

2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听著名经济学家演讲

邹东涛 主编

李增刚 副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www.economyph.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中国之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邹东涛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1

(讲坛之光)

ISBN 7-5017-6200-7

I. 新... II. 邹... III. 新制度经济学—演讲—文集
IV. F091.3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26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魏民 刘晨 (电话: 010-68319110)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52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7-6200-7/F·4981 定 价: 45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53507 68341876 68341879 68353624

总序

讲坛是现代社会的活动内容之一。从广义上说,讲坛既包括国家的或国际的各种会议论坛,也包括所有学校的讲台。讲坛是大的讲台,讲台是小的讲坛。无论是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讲坛,还是中国山村小学老师的讲台,都是人们纵论天下大事,表达、交流思想和主张,传播知识、信息和智慧的重要场所。

“讲坛”二字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作为一个讲演者或教师,登上讲坛讲演或授课,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压力。因为若要向听众和学生奉献一碗水,肚中至少要储存一桶水。演艺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行训也完全适用于教育界、教师和讲演者。

在世界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潮流的发展时代,讲坛不再是单向灌输的高地,而是双向、多向交流的场所。特别是当代思想解放、善于逆向思维和探根研底的青年学生,什么刁钻古怪的问题都可能提出来。所以,讲坛也是对讲演者、教师的考试和考验。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知识的膨胀率、废旧率、更新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时代,一般地说来,青年学生比教师对新的知识、信息和方法接受的要快得多。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不仅要提倡“前向学习”,即学生向老师学习;也要提倡“后向学习”,即老师向学生学习。这与中国“教学相长”的教育传统是一致的。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而讲坛则是学校的核心。教师是通过讲坛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神圣使命的,而学生则是从讲坛获取知识、信息和智慧的。越是高层次的教育,讲坛发挥的作用越是重要。讲坛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尺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专门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的一流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现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68 个,硕士学位授予权 77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2 个。每学年院系共开设课程约 500 门,其中由学校统一组织开设的课程达 80 余门。





成功的讲坛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主要成果,为了把研究生院讲坛的精彩内容贡献给社会以飨广大读者,我们特别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坛之光丛书》(以下简称《讲坛之光》)。首批推出的《讲坛之光——经济中国》一共六卷:其中《中国经济前沿问题》(四卷);《〈资本论〉与中国》(一卷);《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一卷)。之所以把我们开设的讲坛称为“讲坛之光”,一是由于讲演人都是学界大家,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和专职教师,也有从北京和全国各地请来的著名专家学者,还有世界著名专家学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谓“讲坛之光”,是这些大家们的知识和智慧之光;二是讲授的内容都是当代前沿论题,是新的问题和情况,新的战略和策略,新的思路和方法,反映了时代之光。

多年来,“中国经济”课程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众多课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过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打造着经济中国,推进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使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各国抢滩的热点。与此同时,经济学也成了热门学科,以至于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这门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为讲课人是经济学界和政府中的著名学者,而且所讲的内容都属于前沿经济理论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实践问题。所以我们将2000年以来的讲演稿汇编成四卷《中国经济前沿问题》。

《资本论》是耗尽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最主要的著作,没有《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伟大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国家,如果不读《资本论》,就很难说怎样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拿什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学校,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为学生开设过《资本论》课程,后来因种种原因停开了。在新的世纪开端不久,在马克思被评为“千年伟人”的时候,我们又恢复开设这门课程。可以说,马克思,久违了!《资本论》,久违了!《资本论》课程的开设大大增进了学生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功底。讲授《资本论》的教师大多是多年研究《资本论》的老专家,我们特别把所有讲演稿汇集为《〈资本论〉与中国》。

新制度经济学是近30年在世界上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一出现就引起各国经济学界的高度兴趣,成为热门研究领域,声誉日隆。因为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很难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而现实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制度转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新兴工业化国



家的控制和管理等等,都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解释和指导。我们在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开设制度经济学,不仅仅是让学生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实践问题,“做中国猫,抓中国鼠”,为巩固和弘扬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小康建设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讲授这门课程的大多是中青年经济学研究者。我们特别把这些讲演稿汇集为《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

越是大家越是谦虚,越是认真、严格。我们请到的讲课专家,都一再谦逊地表示,讲的只是个人体会和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请批评指正。在这里,我们也把讲演人这个意见转达给读者。讲课记录稿整理好之后,讲演人在文字上都要下一番苦工,推敲琢磨。我们向讲演人表示衷心感谢。而编纂方面如果还存在缺点错误,则要我向讲演人和读者道歉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领导班子全力支持《讲坛之光》的编纂出版,许多教职工和研究生都具体参与了编纂工作。研究生院教务处的前任处长许振中教授、现任负责人杨燕同志,从 1999 年就开始编纂“中国经济”讲课稿,李胜、毛小青、邓淑娜、赵燕、张含宇、李为人等同志,都参加了编校工作。许多在校学生,如(以姓氏笔画为序):于明清、王永中、吕之望、朱德武、李中华、时红秀、冷兆松、张蓓、吴海山、李增刚、郑任钊、秦治来等同学在整理讲课录音稿、编辑、校对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本书收入的讲演人照片,除少数是由讲演人自己提供的,其余均由黄晓洪同志现场拍摄。中国经济出版社的魏民、刘晨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魏民同志在四年前就着手整理编辑中国经济讲座的资料,费了很大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愿《讲坛之光》能为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丝光亮。

邹东涛

2003 年 11 月



目 录

1	总 序
	※
1	邹东涛
	制度：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
	※
25	张曙光
	国家理论与政府制度
	※
45	樊 纲
	产权与交易费用
	※
61	张曙光
	制度与运行分析





- 81 **秦 海**
制度的历史分析
 ※
- 103 **杨如彦**
公司公募融资：以可转换债券为例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
- 141 **赵 晓**
公共政策背后的制度分析
 ※
- 155 **邹东涛**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制度解析及其他
 ※
- 167 **张宇燕**
公共选择理论
 ※
- 187 **柯荣柱**
制度分析的基本技术

207	樊 纲
	转轨经济的理论分析
	※
247	李增刚
	制度经济学的三大范式
	※
279	林毅夫
	自生能力、经济学与国企改革
	※
295	邹东涛
	私营企业主：理论冲突与制度容纳
	※
313	黄少安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三个假说及其验证
	※
337	刘 伟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 355 邹东涛
为企业家造一把“制度伞”
※
- 373 秦海
法与经济学的起源、方法和流派
※
- 401 何帆
财政压力与制度变迁
※
- 419 杨瑞龙
“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
※
- 439 何帆
WTO的真实故事
※
- 469 邹东涛
所有制理论要与时俱进 所有制改革要不断创新
※
- 494 后记



度：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



讲演人：邹东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邹东涛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1976年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1986年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工作。1993年到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1993年12月，经参加全国公开招考（中央国家机关首次），选任国家体改委经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主要著作（含主编）有：《经济竞争论》（1988合著），《宏观经济学》（1989主编），《微观经济学》（1990主编），《十字路口上的中国》（1992合著），《中国建立市场和有效竞争的措施》（1992德国），《转轨的中国》（1996合著），《中国加入WTO的宏观分析和行业对策》（1999合著），《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2001），《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2003），《理性扩张：春兰发展的道路》（2003），《管理学》（2003主编）。主编丛书有：《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1993，14卷），《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丛书》（1996，16卷），《中国西部大开发全书》（2000，4大卷，400万字），《哈佛模式全书》（2003，57卷）。发表学术论文约500多篇。





制度：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①

讲演人 邹东涛

(2002年3月7日)

近十多年来，制度经济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在中国和世界上影响都越来越大。为了使我们的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而且也能够学会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我们特开设制度经济学专题讲座课程。我作为学校的教学负责人，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责无旁贷来作这个专题讲座的开场白——姑且叫“导论”吧！我讲的题目是《制度：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1）阐明制度为什么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2）有效率的制度才能推进生产力发展；（3）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会存在；（4）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干什么——“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一、制度：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

这个题目似乎有一些挑战性。因为邓小平同志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这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我经过较长时期的思考，在 1998 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制度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本质、最根本、最基础的要素。《改革内参》发表之后，被中国生产力学会评选为“优秀论文特等奖”。

^①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制度经济学系列讲座”中的第一讲导论，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定。



在写《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提法会不会造成理论上的冲突和争议？冲突和争议之一是：我们过去长期学习和接受的基本理论常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按照这个基本常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是不直接发生关系的。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把制度与生产力不仅直接连接起来，而且把二者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颠倒”了过来，“制度”越过“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两个环节直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岂不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吗？

我在想，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谈话有一句重要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当时有的人认为，这句话不符合基本语言规范和语言常识，因为“道理”从来只有“大”、“小”之分，毛泽东说过“大道理管小道理”，哪还有“硬”、“软”之分，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什么是“软道理”呢？邓小平毕竟是伟人和领袖，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不同见解只是私下议论一下而已，绝大多数人看重和关注的是一个论断是否揭示了客观真理，是否符合人民根本利益。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已经公认为揭示了客观真理、符合人民利益的伟大名言。

人类历史纷繁复杂现象的基本原理往往是十分简单的。1883 年 3 月 17 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的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基本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①在这里，马克思把人们的吃、喝、住、穿这类比生产力更具体的内容与政治、国家制度、法、艺术、宗教等典型的上层建筑直接联系了起来，中间缺少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岂不是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常识”吗？

在人类历史上，究竟什么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呢？欧洲文艺复兴和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科学技术加速发展，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技术；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速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74 页。



展，邓小平同志充分注意到这个情况，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但是，我们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否深入论证过科学技术是否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自发地成为第一生产力？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技术”，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已被近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并且已经成为人们思想上、理论上的共识。

但是，无论是在曲折蜿蜒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一些悖论现象，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能够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例证之一：十一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富于技术革新的时代，水和风开始推动转轮碾磨粮食和开动漂洗机。但这些技术革新并没有帮助人们越过“马尔萨斯陷阱”，使产量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

例证之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并未引起生产力的任何革命：发明火药，曾只是用来做花炮，放焰火，供消遣或祭奠之用。而别的国家却学了去开矿山、修隧道、造枪炮，发展经济与国力，最后使中国饱受人家炮火的“洗礼”；发明指南针，曾主要用来看风水，光宗耀祖；而人家却学了去开辟新航道，发现新大陆，发展世界贸易，最后用廉价商品这门重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在十四世纪已发明了焦炭炼铁术等，据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证，这在科技上已具备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无疾而终”^①。

例证之三：在历史上统一的时代，埃及已经有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解决了水蒸汽的动力问题，但是埃及始终将其用在玩乐上，而没有用到生产上。而在英国却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例证之一：十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马尔萨斯循环规律”，特别是英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这个时期在工业和农业的技术上的变化一般说来是没有的”^②，两国“工业方面的发展同农业一样要归因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财产所有权”^③。就人类伟大的工业文明来说，众所周知，手工业工场是

①（法）罗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②（美）道格拉斯·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③（美）道格拉斯·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近代工业的摇篮，而手工业工场初始的发迹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工艺的改变，有决定意义的只是生产集中到工场，进行了分工协作而已，但机器便由此诞生了，波澜壮阔的工业文明由此拉开了序幕。如果没有产权制度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生产组织的改变等制度创新，那么，人类便不可能迈入工业文明！

例证之二：日本是从“明治维新”逐步走上强国之路的，而“明治维新”并不是科技维新，而是制度维新。

例证之三：战后西德经济的快速繁荣，首先不是来自科技的繁荣，用西德经济起飞之父艾哈德的话说，是“来自竞争的繁荣”。而竞争问题，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制度问题。就现代各国经济发展来说，亚洲“四小龙”、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崛起以及目前许多国家的振兴，与其说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例证之四：中国广大的农村，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仅仅一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甚至在科技退步的情况下^①，农业生产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短短三五年时间，就初步解决了改革前 30 年“全党大办”、“全国大办”也未能解决的、长期使党和政府焦虑的人民吃饭问题，继之又形成了农民卖粮难的丰收局面，而且，还腾出了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军非农产业。那么改革早期这三五年时间里，农业突飞猛进发展是得益于科学技术吗？显然不是。

这些例证说明，科学技术尽管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并不能自发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得到进展、得到运用？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能够很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不能？即便是同一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某个时期科学技术可以推进经济进步、经济发展，而另外一个时期却不能？这就引进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东西是深层次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

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还是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运用，都需要有一个与之相契合的条件和基础，要有一个内在机制，我想这个条件和基

^① 在一些川、坝农村，改革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如成片土地的统一机耕、机收。分田到户之初，各家田地划小了，许多农机具一下子不用了，各家恢复了传统作业，这在技术上显然是退步了，但农业产出却大幅度增加了。



础、这个内在机制就是“制度”——社会经济制度。从这点就可以延伸为“制度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生产力有“两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三要素”之说。但这种理论已不能解释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除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之外，更包括制度要素。因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既定制度下的存在，并且只有通过一定的制度才能组合在一起而发挥作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能动因素是人，而人的“三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由制度决定的。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 1841 年通过对西方诸国经济史的对比考察指出：“历史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出来的。”^①在不同的制度下，生产力诸因素的组合方式和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的设备，也可以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然而，即使有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若被安装在低效的制度环境里，其效率低得可能不如手工操作。当代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低效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国经济的落后，科技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其背后的实质、根源，是制度的落后。中国的农业，西汉时期就发明了牛拉双铧犁，一拉就是两千多年没有多大变化，其深刻原因，就是没有建立一套有效地激励和保护创新的制度。

1983 年，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代表作《第三次浪潮》在我国出版了，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此同时，也播放了一部托夫勒关于第三次浪潮和信息革命的讲演录像。在这部三个多小时的讲演录像中，托夫勒从历史和世界的时空，介绍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但在最后一段的结束语中，托夫勒却说道：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时代浪潮的形成，关键不在于科技，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尤其重视知识进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研究经济增长的大腕们却从来都把“制度”看作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1971 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对“经济增长”下了著名的定义，他指出：一国的经济增长可定义为“不断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技术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

^①（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 98 页。



需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①这就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标志是生产能力的长期提高，先进技术是生产能力长期提高的基础，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则是基础的基础。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更重视制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一批“制度经济学”著作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决定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的关键在“效率”。而在影响“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制度的效率”则处于核心的地位。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制度的变迁是根本的变迁。道格拉斯·诺斯指出：“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等，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②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成就和改革的深化问题，于是，中国的制度经济学也逐步形成和兴盛起来了。我写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一文后，看到了吴敬琏的一篇文章《制度高于技术》^③，这篇文章实际上也阐述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林毅夫把他的农业研究文集取名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④，在这个书名中，特意把“制度”放在“技术”前面。樊纲在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指出：“制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决定经济效率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⑤卢现祥在分析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时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并不仅仅在资本、技术、劳动力上的差异，最基本的差异是制度。”^⑥我在《市场经济与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和递进发展》一文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与制度文明，指出：“人类社会不仅要不断地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又要保护和发展这种文明。那么，靠什么来保护和发展的文明呢？这只能是制度文明。……在整个社会文明中，制度文明处于关键地位。在制度的一切内容中，政治制度处于核心地位，因而，

① (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反映》，载《现代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4页。

② 转引自卢现祥：《西方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③ 吴敬琏：《制度高于技术》，载《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6月18日。

④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⑥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